

大学探究精神的 重生与衍化

以西南联大为个案的诠释

The Renascence and Derivation of University's Inquiry Spirit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王喜旺◎著



科学出版社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探究精神的生成与流变：
以西南联大为个案的透视”（课题批准号：DAA100193）研究成果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高等教育与区域
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大学探究精神的 重生与衍化

以西南联大为个案的诠释

The Renaissance and Derivation of University's Inquiry Spirit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王喜旺◎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大学精神是一个由众多精神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探究精神是大学精神整体结构的核心。因此,对大学的探究精神进行系统的、原发性研究,既可对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也能够为当代大学精神的重建提供可资参考的思想方案。本书以西南联大这一中国现代社会最高水平的大学为个案,对大学探究精神的生成机制、结构形态、辐射效应、独特价值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梳理、分析,指出了当代大学探究精神重建的路径。

本书对中国现代大学的研究者、大学整体改革工作的研究者和广大师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适合对民国大学的精神取向、当代大学整体变革等问题感兴趣的朋友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探究精神的重生与衍化:以西南联大为个案的诠释 / 王喜旺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03-046327-2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西南联合大学—科学研究—工作
IV. ①G649.28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1080 号

责任编辑:朱丽娜 孙文影 高丽丽 / 责任校对:李 影

责任印制:张 倩 / 封面设计:楠竹文化

联系电话:010-6403 3934

电子邮箱:fuya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安泰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2 1/2

字数:201 000

定价: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大学精神研究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围绕其形成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纵览既往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它是从两个路径切入的：一是要素的路径。即通过揭示精神要素的途径来透视大学精神。诸如人文精神、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民主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世界精神、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学术精神、爱国精神、拼搏精神、求真求善求美精神、宁静等，都被视为大学精神的要素，被提炼、呈现出来（刘亚敏，2004：15）。二是功能的路径。即从功能的角度入手来认识大学精神，强调“大学精神”在大学生存与发展中发挥的功能。从这一路径出发，往往把大学精神视为大学赖以生存的支柱、大学前进的动力、大学发展所积淀的精髓与灵魂、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等（徐本林，1999）。在笔者看来，沿着这样两种路径产生的研究成果均存在着重大缺陷。从要素的路径来看，其缺陷是既往的论者没有把大学的探究精神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来看待。众所周知，大学是以探究真理为其根本使命的，因此，探究精神必然是大学生存、发展的“生命线”。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失去探究精神，大学将变成一具裹着鲜丽外衣的腐朽躯壳。有鉴于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把大学的探究精神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要素来对待。令人费解的是，既往的研究者却忽略了这一点。从功能的路径来看，其缺陷是既往的论者没有关注其对大学当中的主体所发挥的作用。作为负责任的研究者，我们固

然要关注大学精神对于大学这一整体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我们的关注焦点不能止步于此，还应该把视线向身在其中的主体转移。毕竟大学不只是一架庞大的学术机器，还是一个由无数鲜活的生命组成的“有机体”。如大学精神对于身处大学这一场域的学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就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遗憾的是，既往的研究者并没有关注这一点。

既然如此，我们要想在大学精神研究上有所突破，就特别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把探究精神作为大学精神中独立的精神要素来研究，弥补其在要素分析上的缺失。二是关注大学精神对于学生所发挥的作用，解除其在功能分析中的主体遮蔽状态。如果把这样两个思路进行叠加，我们可以选择的研究路径便是：把探究精神作为独立的研究要素进行系统研究。在这一研究中，除了关注其对于大学整体的功能之外，还要特别关注其对于身处其中的学生所发挥的功能。

要把探究精神作为研究要素进行系统的、原发性研究，可取的路径有两条：一是哲学思辨研究，即从纯粹学理的角度，对探究精神的本质、生成机制、结构形态、功能等问题进行一般性的学理探讨。二是历时态研究，即选择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学群或某一大学，梳理、描述其探究精神的生成机制、结构形态、功能等要素。笔者作为一名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最为便捷的路径选择便是进行历时态研究。进行历时态研究，比较方便的方式是选择一所典型的大学作为个案，对其进行研究。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便是一个适切的研究个案。之所以这样说，理由有二：一是西南联大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西南联大是一所在抗日战争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而成，具有典型的现代意义的大学。它在短短的9年中（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1996：序），培育出了在各个学术领域如群星灿烂般的知名专家、学者，让我们现在的研究者不得不发出“不可思议”（陈平原，2003：242）之叹。其之所以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根本原因便是探究精神始终是其生命历程中蓬勃、洋溢着的精神气质。正是因为探究精神一以贯之地发荣、滋长，才会导致教师探究、创造热情的不可遏止与学生参与探究、创造激情的蓬勃生长，铸就了西南联大学术生产上的辉煌与育人业绩上的荣耀。二是精神史的视角是既往的西南联大研究中所缺失的。纵览有关研究西南联大的著作与论文，我们不难发现，如果从研究的

视角来看，它们主要是从教育史、文化史、学科史、知识分子史等视角出发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经打破了教育史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这是令人欣喜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就此止步，因为不少研究的视角仍在我们的视野之外（王喜旺，2006），如精神史、社会史、两种乃至多种视角的互动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此而言，从探究精神的视角切入，对西南联大进行研究，恰好可以超越以往西南联大研究视野的局限，丰富对西南联大进行研究的视角。

总之，无论从大学精神研究的视野中来观照，还是从西南联大研究的视域中来考察，以西南联大为个案，对大学的探究精神进行系统研究，都是具有突破、创新意义的。因此，笔者才会不揣浅陋，试在这里以西南联大为个案，对大学探究精神的生成机制、结构形态、独特功能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总结、阐发。

王喜旺

2015年5月16日



前言

第一章 探究精神重生的机制 1

第一节 繁复的内部支持条件 2

第二节 不可或缺的外部屏障 16

第二章 探究精神的结构形态 23

第一节 以赤诚之心投入学理探究 24

第二节 以救国为旨归的勉力探索 28

第三节 对学术独立的奋力张扬 33

第四节 自由探究的自然彰显 37

第五节 对会通之境的不懈追求 44

第三章 探究精神在教育领域的投射 51

第一节 以自由探究为指向的育人目标定位 52

第二节 自由探究的风姿在课程中的映现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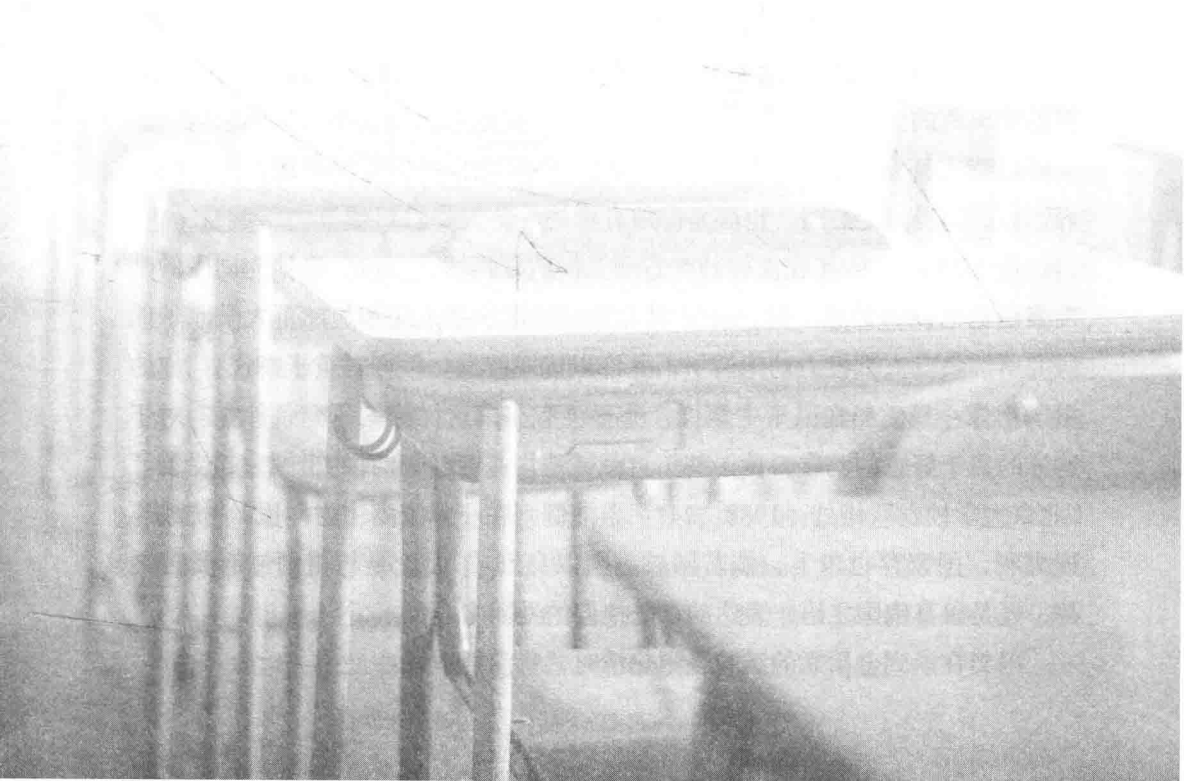
第三节 探究逻辑的迁移与教学探究性的凸显 63

第四节	作为学术独立、自由屏障的管理制度	71
第五节	蓬勃滋长的课外探究热情	77
第四章	探究精神对学生的塑造	85
第一节	贯通自然与人文的知识根基的奠定	86
第二节	探究方向的确立与研究方法的获得	88
第三节	探究理念的潜移默化	93
第四节	别样学术道路的开启	97
第五节	智性品格的陶冶	105
第五章	探究精神的衍化轨迹	115
第一节	忘我的探究热情蓬勃生发（1937—1940）	116
第二节	师生共同探究学理的空前凸显（1941—1943）	129
第三节	学术研究与政治生活的紧密勾连（1944—1946）	140
第六章	经验与启示：探究精神在当代大学的重建	159
第一节	作为精神复合体的探究精神	160
第二节	确立以探究真理为指向的价值坐标	163
第三节	以探究性教学的推行为枢机	166
第四节	回归教学自由	169
第五节	搭建内部不同问学主体间学术交流的制度平台	172
结语		179
参考文献		183
后记		191

第一章

探究精神重生的机制

探究精神是和平时期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本具的精神气质，但是到了西南联大时期，由于西南联大学人面临战火中的危难、生活的倍加艰辛、学术资源的极度匮乏、三校分合的摩擦等不利条件，探究精神在西南联大面临着解体、消亡的危险。幸运的是，由于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探究精神不但没有成为这三所大学的“消逝的风景”，还在西南联大得以重新生根、开花、结果，获得了“凤凰涅槃”。下面我们就返回当时的“语境”中，对其重生的机制进行剖析。



第一节 繁复的内部支持条件

一、西南联大学人的“道德热情”

西南联大学人能够如抗日战争前一样，坚持对自然、人文之道的探究，甚至犹有过之，其根源在哪里呢？今人张莫宙在为陈省身作传时曾一语道出：“战时的西南联大，生活简单困苦，但学术研究十分活跃，为常人所难以想象。理由很简单，所有的人，都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张莫宙，王善平，2004：85）考之于史实，我们就会发现，张莫宙所言不虚。

诗人与学者闻一多被胸中的爱国热情之火灼得热血沸腾，禁不住在给其学生臧克家的信中滔滔不绝地倾诉：“我只觉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闻一多，1986：316）其他西南联大学人虽不像闻一多那样以诗人特有的热情，用诗一样的语言来倾诉自己的爱国热情，但他们在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时，也都是掷地有声的。

黄子卿于1936年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当他向周围的师友表示自己回国的想法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系主任和芝加哥大学原子能研究所的负责人都极力劝他留下，并许以优厚待遇。他们对黄子卿说：“你的祖国正像一只破船在风雨中飘摇，哪里会有美国这样好的研究条件？”对于这样的出于好意的劝告，黄子卿斩钉截铁地说：“我愿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北京大学校友联络处，1988：247）李继侗则在一封家书中这样说：“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无论是与祖国一起受苦之辞，还是以身殉国之语，表达的都是他们的爱国之心。

冯契在谈到金岳霖的满腔爱国热情时，曾深情地说：

当时有些进步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战地服务团，决定到北方前线去参加抗战工作，我也报名参加了。临走之前，去向金先生告别，他非常赞赏我的行动，连声说“好，好！我要是年轻二十岁，也要到前线去扛枪”。我后来一直记着他讲“扛枪”二字时的那种满腔热情，这对我确是最好的鼓励。我在北方两年，1939年又回昆明西南联大复学。金先生一见到我，就约我到他住处去谈谈。他特别为我准备了咖啡和点心（这在当时大后方是很难得的），详细地问我在前线的情况和所见所闻。我如实地讲了自己到山西前线、又到延安、并随八路军到了晋察冀和冀中等地的主要经历，介绍了敌后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敌的许多事迹。他显然听得很高兴，不时地插话：“八路军真能打仗！”“噢，游击队神出鬼没！”“照这样说，中国人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他还说，他们这一代人，一直担心中国要被瓜分，要亡国，能把日本鬼子打败，中国就有希望了。（刘培育，1995：151-152）

金岳霖不但对于自己的学生上前线抗日的举动表示极度赞赏，而且在其学生从前线归来后，对抗日前线的战况表现出特别的关心，足见金岳霖对于抗日战争期间祖国命运的高度关切。如果胸中不蕴积着火一样的爱国热情，是不可能有着那样的言行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摆在一个有着爱国热情的学人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投笔从戎；二是继续以学术为业。在这两种选择之中，西南联大学人虽然对投笔从戎的行为颇为欣赏（如金岳霖的上述言行即是明证），但基本上选择的是后者。西南联大学人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道路选择，不是激情冲动的结果，而是在知识分子于国难之时如何自处、如何以属于知识分子独有的方式救国这一问题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决断。这一点，从贺麟的文章中不难看到。

正当国难之时，贺麟曾撰有《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的态度》这一长文，可谓一篇极为难得的知识分子考量其战时生存方式的代表性文献。在该文中，贺麟主要讨论了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在国难中的生命姿态、生存方式。其主要观点是：

1806年10月，拿破仑亲率重兵直捣德国，当时魏玛公爵府中的其他幕僚“走避一空”，只有作为魏玛公爵府高级幕僚的歌德处之泰然，毅然留下，使耶拿大学在战乱中仍能弦歌不辍。因此，贺麟称许歌德具有“诗的人品”，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大军压境，生命受到威胁时，都能葆有对生命本真的无尽的爱，对个人际遇的超然姿态。^①

相比起歌德的“诗的人品”，黑格尔则是“散文式的”。从个人品质来说，黑格尔崇尚脚踏实地，平淡无奇，不浪漫，少风波。从运思取向上来说，黑格尔“特别注重文化历史的研究，以明了祖国的民族精神，立国根本，以及古圣先贤所遗留下来的国粹或文化之所在”。从个人身处国难时的姿态选择来说，黑格尔则主张知识分子“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坚持自己“死以求生或死中求生的信心、希望、拼命精神”。在这里，贺麟突出强调的是两方面：一是民族、国家复兴的希望与长久生存、发展的根本只能在文化研究中寻求。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只有知识是惟一的救星。惟有知识能使我们事变之来不至如禽兽一般之愕然吃惊，亦不至仅用权术机智以敷衍应付目前的一时。……惟有知识才能使我们不至认国运之盛衰国脉之绝续仅系于一城一堡之被外兵占领与否”。二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坚守自己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岗位。这是一种更为根本性的基础工作，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苦卓绝的辛劳。^②

与歌德和黑格尔比较，费希特则是“富于戏剧意味”的。在法军占领普鲁士之时，费希特怀着必死之心作了他的著名的“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且连续多次给德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而在此之前，书商帕尔姆由于出版了《德国处于深深的屈辱之中》一书而被拿破仑处死，人们对之依然心有余悸。当此之际，他的连续讲演更显示了其超乎常人的勇气和鲜明的民族立场。为了突出费希特的这一特点，贺麟还把黑格尔与费希特身处国难时的态度以这样的设问形式加以对比：“当法军占领德国时，黑格尔曾打电报没

① 贺麟.1931-10-26.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

② 贺麟.1931-11-2.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

有？曾发宣言没有？他曾公开演讲若干次？他抗法救国的标语如何？想来，他总少不了要发出一个重要的快邮代电，以表示他爱国赴难的决心？”最后的回答，自然都是否定性的。另外，为了突出黑格尔的立场，贺麟还特别总结说：“黑格尔的全部热情，志气与精神，差不多尽注在他的学说里，而未十分表现于外表的末节上。”^①

那么，贺麟对于德国这三大伟人身处国难时的生存方式的选择，究竟更为推崇的是哪一种呢？贺麟的至交、深知贺麟其人的吴宓给出了答案，他在读了贺麟的长文之后，断然认定：“篇中凡描述黑格尔之处，亦即作者个人主张信仰及其成己济世之热诚之表现也。”^②吴宓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贺麟明确主张知识分子在国难之时，应该像黑格尔那样“各安其分”，把知识当作“唯一的救星”，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贺麟是在经过周密而审慎的思虑之后，认定文化研究、创造的工作是知识分子在身处国难时最有意义的工作，才无怨无悔地选择投身学理探究的。

对于许多西南联大人来说，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其理性抉择的心路历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与贺麟同样有着对“文化研究”的独特、神圣意义的体认。

二、对学术救国意义的体认

对于西南联大学人是如何认识学理探究之于挽救国家的危亡所具有的意义，朱自清曾做过概括性的说明，他说：“教授们也感觉到，自己上战场打仗是不太可能的，自己的任务就是保持中国弦诵不绝。这个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张曼菱，2013：27）也就是说，西南联大学人深切地认识到，上前线扛枪非学人所长，学者以探究自然、人文真理为业来救国，有着其他救国方式不能替代的重大意义。从不少西南联大学人的言论中，我们都可看到这一点。

① 贺麟.1931-11-9.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

② 贺麟.1931-10-26.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

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的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万千倍。杜渐而防微，舍我辈其谁堪任之。”（赵新林，张国龙，2000：73）在这里，闻一多可谓目光如炬，他不仅看到了日本侵略中国可能带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上被他国“征服”的危险，还看到了文化上可能被该国“征服”的危机。在洞见了这一点的同时，他也认识到了作为学者的使命与价值：依靠学人点滴的努力，防止日本在文化上征服中国。从他的“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万千倍”一语来看，他对学者的这一使命与价值看得甚为重大、神圣。

在钱穆看来，“非国家、民族不永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之息绝为可悲。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钱穆，1948：1）。在这里，钱穆把民族文化看作一个国家存亡续绝的根本。既然民族文化关乎国家的存亡，那么我们要想使中国不致亡国，就必须想方设法保存中国的民族文化。而中国的民族文化，主要表现在中国以往的全部历史中，所以钱穆特别“强调在抗战中重建国家，必复兴文化，要唤起民众的民族觉悟，必先认识历史”（田亮，2005：259）。可见，钱穆把知识分子的国史研究提高到了挽救国家危亡的高度来认识。

沈从文则认为，“在任何困难中莫灰心丧气，是我们这个民族明天翻身的唯一希望。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中国所有年轻人的事。这不正是我的理想，还是我的信仰”（沈从文，2002：19）。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研究的知识分子，对于实现“这个民族明天翻身的唯一希望”具有什么意义呢？沈从文认为，“文学运动的意义，是要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活力。……好的文学作品照例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沈从文，2002：18）。

虽然闻一多、钱穆、沈从文三氏在立论时的角度不无差异，但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想法：学者通过学术工作实现文化与学术的传承、创造，对抗战兴国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正是因为西南联大学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们才把自己的爱国热情全部倾注在学术工作上，以期能以探究自然、人文之理的方式为抗日战争作出

贡献。

例如，曾昭抡在学术上所达到的忘我的程度，真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撰委员会，1999：192）。对他的那种行为的根由，曾与他相交颇深的费孝通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他（曾昭抡）对化学着迷并非出于私好，而是出于关心祖国的前途。科学落后的情况和因此而会带来的祖国的危险，他知道得越深刻，就会觉得自己的责任越重。他一心扑在科研上，科研上的问题占满了他的注意力，走路时见不到熟人，下雨时想不到自己夹着雨伞，盛饭时分不出饭匙和煤铲，睡觉时想不到宽衣脱鞋，这些岂能仅仅列入怪癖的范畴？”（《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撰委员会，1999：214）可见，曾昭抡之所以有种种怪异之举，是爱国之心驱使下忘我地投入科研所致。

郑天挺身为西南联大的总务长，却没有因为行政事务影响治学，而是在处理行政工作之余，全力投入到历史研究工作中。他在其自传中这样说明自己如此做的动机：“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爱国分子，不能身赴前线参加革命，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冯尔康，郑克晟，1991：802）从他的这一自我告白中可以看到，他与曾昭抡的行为动机如出一辙。

总之，正是因为西南联大学人有着炽热的爱国热情，又对自己服务于祖国的独特的价值有着清晰的定位，他们才把爱国的情转化为忘我地投入学术工作的动力，孜孜不倦于自己的探究工作。

三、超越艰难困苦 的达观襟抱

爱国热情与对学术救国的意义体认固然是西南联大学人投身于探究真理的事业中的动力，不过超越艰难困苦 的达观襟怀也是其沉浸在探究真理世界中不可缺少的助力。因为西南联大学人不是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而是身处危难与困苦中。如果没有从苦境中超拔出来的情怀与境界，他们就会陷溺在生活的危险和艰苦中不能自拔，成为随波逐流的庸众，不可能以安然、平静的心态从事探究自然与人文之理的工作。那么，他们面对的生活情境是何等地危难与困苦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从1938年9月开始，西南联大的师生便处于时时有可能遭受日本侵略者空袭的危险之中。最初，日本人对昆明的空袭只是为了对大后方进行骚扰，从精神上对大后方的民众进行威慑，轰炸昆明的次数尚少。后来，在日本人占领安南、缅甸后，云南便成为抗日战争的前沿，日本飞机就开始了昆明更为频繁而疯狂的轰炸。“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而且很准时，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何兆武，文靖，2006：180）

空袭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让人们不得不经常面对死亡的威胁，这自然会给人们带来心理上巨大的恐慌。在许多西南联大学人的日记中，都对这一点有过描述。

如1940年10月12日的空袭，就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冲击。那天，27架日本飞机飞入昆明上空，“投弹百余枚”，重点的轰炸目标是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这次轰炸致使“云大及联大师范已全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文化巷口棺木罗列，全巷几无存屋”。死亡与毁灭就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惶惶无所归宿”。当天晚上，吴宓原打算继续他的“欧洲文学名著”一课的讲授，但因为“仅到许渊冲等二生”，没上课。15日，他上“文学与人生理想”一课，“到者五六学生”（吴宓，吴学昭，1998b：246）。其间，像吴宓这样的名教授所上的非常叫座的课都很少有人上了，学生在心理上所受到的震撼可以想见。心理上恐慌的不仅是学生，教师亦然。据曾昭抡1940年10月13日的日记记载：“昨日敌机狂炸昆明后，我等住宅前后，落炸弹甚多。附近数屋变成一片废墟，有一屋全家六人均被炸死。联大师范学院的男生宿舍全毁，学校负责人，竟不露面。在办公时间内，全校无一人办公。”（《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编撰委员会，1999：336-337）偌大的一个西南联大，在飞机轰炸之后，连一个办公的人都没有，可见其时教师们在心理上是何等惊骇。

为了躲避空袭的威胁，只能选择“跑警报”，为了躲警报，把上课时间都改了。本来是8点钟上课，改成了7点，一节课也改成40分钟。日本飞机经常10点多钟来，到10点钟的时候，课差不多上完了，一来警报，全校师生赶紧就往郊外跑。下午呢，因为当时的日本飞机飞得比较慢，它要飞回越南去，需要时间，所以3点钟以后，飞机就不再来来了。3点钟又解除警报，开始上课（张曼菱，2013：152）。

空袭的灾难虽然惨烈，也对西南联大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尚可到乡间、山野间逃避，且不是每时每刻都必须面对，贫困之苦就不同了，它如影随形般折磨着西南联大人。

陈寅恪曾有诗描述他自己当时生活窘迫的程度：“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1996：73）陈寅恪是为数极少的教育部部聘教授之一，还有着“中央研究院”的兼职，其收入远远多于普通教授，连他都为通货膨胀之速感到“惊心”，为生活贫困而忧虑，其他教授的生活就更困难了。

闻一多一家八口人，不得不住在一个“楼下就是马厩、牛棚”的小房子里，床上、地铺上挤得满满的。为了节省开支，闻一多常常在早上领着他的孩子们去小河边洗脸。傍晚的时候，他又领着孩子们到收获过的稻田里捉蚂蚱和田鸡。尽管节衣缩食，但收入还是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只好“借贷度日”，甚至还“拍卖了自己仅有的一件大衣”，“忍痛卖掉自己最心爱的藏书”（《闻一多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1980：409-410）。这样的生活，用“饥寒交迫”、“斯文扫地”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闻一多是这样，朱自清的日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1942年冬天，天气格外冷，朱自清“既没有大衣，又没有力量缝制棉袍”，便只能在集市上买了一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他买不起那种“细毛柔软而且式样好的比较贵些”的，只能买便宜的那一种。出门的时候披在身上，睡觉的时候当作褥子铺着。对此，何善周感慨道：“据当地的庄稼人说，那年冬天在昆明要算十年来最冷的气候了，而朱先生就这样度过了那寒冷的冬天。”（郭良夫，1987：245）堂堂的大学名教授，在天气最冷的冬天，连件像样的御寒的大衣都买不起，真是穷得让人心酸。

与闻一多、朱自清二氏相比，吴有训的日子就更为艰苦了。为了维持吃饭，吴有训把家中稍值钱的东西都卖掉了。由于操劳过度及营养不足，吴有训患了伤寒病，卧床近两个月，靠他原来健康的底子和他的夫人日夜精心护理，总算战胜了疾病，但这场大病却使他得了手颤抖的后遗症。为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吴有训的夫人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之外，用她擅长国画及刺绣的特长，设计出各种图案并刺绣成各种制品，出售给那些在“珍珠港事变”后来昆明协助中国作战的盟国军人，补贴当时的家庭开支（吴有训百年诞辰纪念